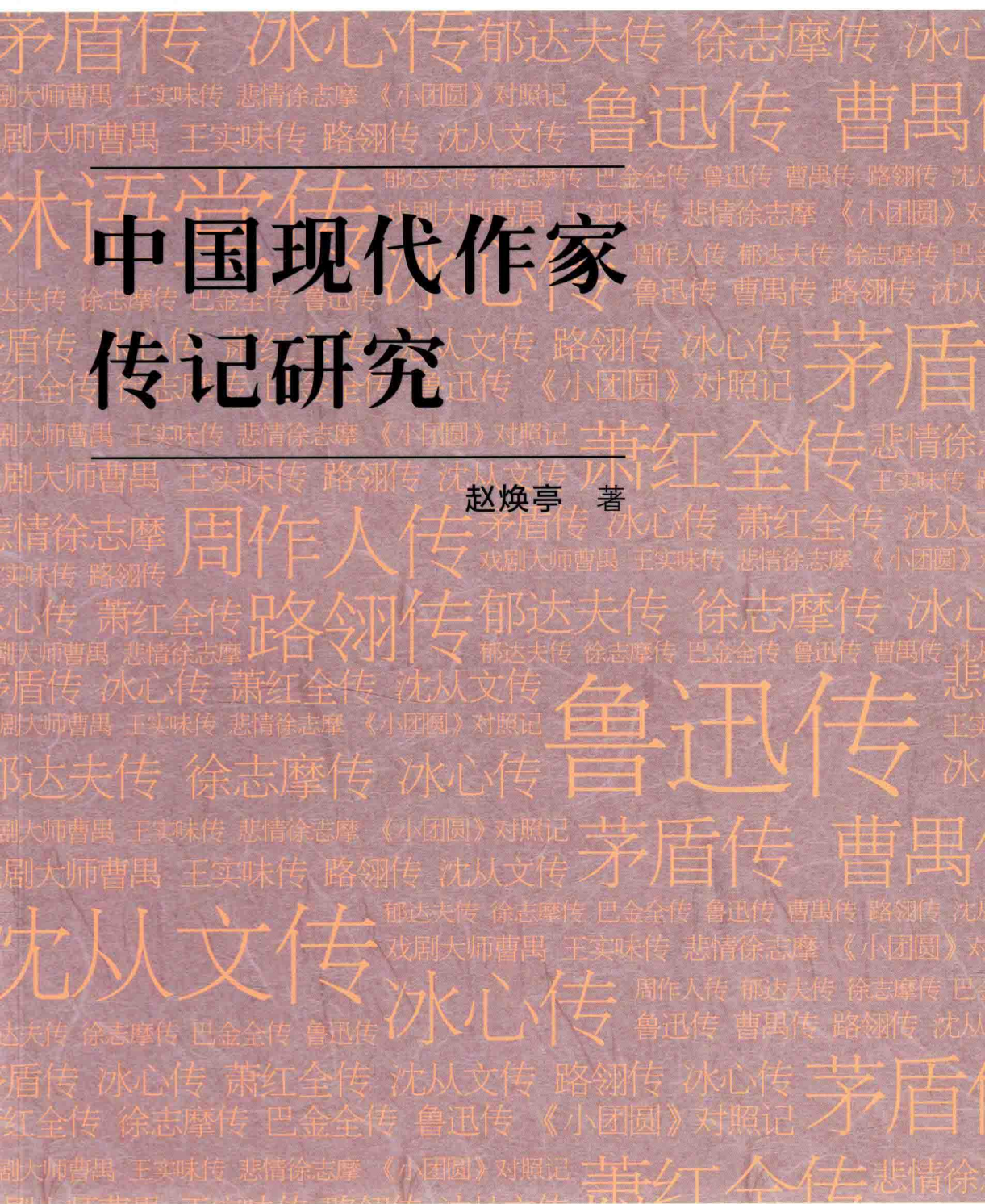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 传记研究

赵焕亭 著

中国现代作家 传记研究

赵焕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 / 赵焕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61 - 9161 - 3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作家—传记—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6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潜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

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书序

吴福辉

在我的印象中，赵焕亭研究现代作家传记的时间很长了。甚至私心以为这研究已经停顿。认识赵焕亭是因近二十年来在河南大学博士点的工作，豫地各阶段年龄、资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慢慢都熟识了。后来她到北京读学位，曾多次听她谈起过这个题目，当时觉得还新鲜，关注点也容易集中，为此要读多少让人血脉贲张和并不轻松的书籍呀，劳动强度很大（翻看附录里的作家传记统计索引就知道了）。赵焕亭是个本分的人，有股子韧劲，咬住一个课题不放才符合她的性格。还好，她证明了自己，眼前的这部书稿终于被她“磨”出来了。

书稿开头便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作家传记写作形成了一个繁盛期。这标志是每一位现代作家都有了一部到几部的传记。创作多而杂，泥沙俱下以及对它们研究的严重滞后，成了实际的状况。本书正是立足在这个富于“中国特色”的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段作家传记创作潮流的澎湃汹涌，自然就不会有今天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记写作已经沉淀40年了，方有了这一领域的材料和理论的积累，有了今日的研究视野、格局、手笔。早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有。书中对这样的研究趋势做了分析，认为是时代的转折、新的文化环境的组成和读者趣味的导向，共同构成思想禁区的某种突破所致的。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想补充的是，还有一代传记作者观念转换的原因。带头写作现代作家传记的，大都是学者出身，研究作家原是本行的本行，可是过去是用僵硬的教条来衡量人的，不颂圣不能写，今不如昔不能写，盖棺不

论定不能写，各种限制套在脖子上，无法畅言。现在他们觉得有许多话可说，要一吐为快。此外，原来天天研究的是别人的文学创作，所写只是论证这些作家，现在等来了描述自己心仪作家的机会了，可以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了，这便是传记写作。这种写作等于是解放了文学的“生产力”，帮助他们实现了“创作”的理想。另外，如果没有传记研究的现况，也就不会有本书。作者是依据当今传记研究存在的四大软肋，针对“现代传记中的作者主体性”“传记中传主作品的呈现”“传记中的原型考证”“传记童年叙事的启示”这四个“薄弱”环节，来进行全书要点的设计，构思结构的。不管这四个问题抓得准确与否（可以讨论），围绕研究现状来提炼问题、铺排论证，确实为本书特色。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作家传记学术价值的有意开掘。传记写作的学术性角度被突出了，还扩大运用了这个角度。本来，作家传记就同时具备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样两个方面，研究者等于是站在两者之间。如果强调了文学，传记即为“散文”之一种，应当作为有述有评的“散文”来欣赏品鉴，作为面对人物的夹叙夹议的文体来研究。而传主及传内其他围绕传主的形形色色人物，是可以使用各种文学手段来加以刻画的。作者在全书透出的意思是认为传记并不等同于散文，它是一种尚未稳定的文类，其实就是隐隐指它内在横跨的学术品格。那么如果强调了学术呢，就可以从有关作家材料的采集、甄别、爬梳、概括，对作家传主的认识的提出、论述的步骤等方面来对待作家传记。学术性成分，明确地体现在本书的结构上。它将传记“写什么”内化了，而让“怎么写”浮出水面，从中提炼出问题给予学术评价，这便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比如纪实和虚构的关系，是传记的理论问题，在这本书的表面就几乎消失了，却在怎样处理作者和传主的关系里将作者的主体性问题浮出水面，成就为第一章（全书仅四章）。于是学术性的纪实和虚构问题，便内化为探讨客观纪实已经不是当今传记的主流，而充分发挥主体性使传记充满记述者的个性的，才是今日关注所在。由传记看学人品格、情感气质和专业特点对写作产生影响，遂成为这一章学术分析的着眼点。同样地，在其他各章里，研究传记作者如何破解、诠释作品，追溯作家的生命过程，如同文学史探究作用的一种引申被使用着。而书中研究“考证”型传记，更具学术性，如同一篇考证型论文之延伸。从传记的史学特征上研究作家生平原型、人物故事

原型的问题，其中以对《路翎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创作的“自传”性质。的确，《路翎传》的写作、考证的过程、结果；路翎出生地、年龄、生父死因、家人亲友与小说人物的对应关系，都一一写进，与传主的文学生命和创作相链接，成为扎实、鲜明的考证型传记。另外，关于童年叙事和童年体验，原应是文学性很强的内容，现在“文学史不大谈作家的童年，而大多数作家传记是从童年说起”并给予这个范畴很高的地位，于是，学术性的眼光在此“童年”视镜里就十分显著了。因而说到底，本书的分析传记作者与分析文学史作者取相似的研究态度。甚至认为，虽然作家传记和文学史有着许多不同的侧重点，但两者可以互补。明确地说明作家传记和文学史可以构成“互文”关系，初听会觉得怪异，想想是有启发性，是有见地的。因为它把作家传记的学术内涵，推到了和文学史并行的地步。

全书从前到后自典型个案入手，以同类的个案结束，既是结构法，也是写作法。在外部，四种作家传记写作的典型现象，平摊罗列。到内部，挖掘出每一题的各个“侧面”，如“童年体验”，可分通向作家的人生走向、显示作家所写作品的文化特征、表明作家的生活哲学、表现童年记忆是众多天才作家的温床，是这样一个面一个面地合成了全像的。“侧面”包括衍生的话题，像本书作者虽然对传记的主体性大加支持，但对部分郁达夫传记的滥情写作，还是提出了不能“过度”的警告。假如历史事实可以随性夸张，“戏说”之风最终会将“主体性”一起埋葬。作者对于各种有代表性的传记，往往用其他传记进行比较，还用传记性的论文来做比较，从而发现背后的隐秘东西。这不是猎奇，不是哗众取宠，恰是传记的读者阅读期待所带来的一条“解密”规则。传记解读作品可以揭示出被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忽略的方面，原型考证可以挖出传主思想的隐蔽角落，儿童记忆可以解开传主和其作品的原始密码，都是重视传记应有的对作家做新发现的作用的。典型个案的写法，好处是显著、集中、容易把握，但也易封闭。围着每本传记的本身转，是难以随时灵活地深入全书要旨的。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把传记本身说得过多，转不回身来，忘记了要紧的是需指向传记写作的总体规律。

此书整体性的理论深度还可提高，但因全书经过长时间的琢磨，就像是流光逝音，会留下了一些发人思考的话题。只要仔细阅读，不同的读者

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发现。比如促发我做专业思考的,就有下面几条。第一,“突出作者主体性是优秀传记的标准之一”,这句话很易引起异议。不过作者有预见性地补充了一句:“作者主体性突出的传记未必是优秀的传记,但优秀的传记一定是突出作者主体性的传记。”这就全面了。第二,在罗列萧红所有作品涉及儿童视角的名单时,我发现重要作品里只有较早出版的《生死场》不在列。《生死场》确实含了较多的政治写作动机(田沁鑫的话剧改编就是抓住此点发挥的),这是否暗示了政治性强的文学文本可能少用儿童视角,儿童视角不仅是叙事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第三,作者抓住了传记文体不确定和传记理论不深入的现况,抱怨其“不足”和“欠规范”,但这是有片面性的。它们固然不成熟,但也是一种“活跃”“上升”的机遇,是提供理论概括的开阔空间和不被成规所拘的好时机。事情要从多面看。

就像文学性传记如研究不透,学术性传记的认知也会受到制约一样,这两种传记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学术性传记也罢,文学性传记也罢,都应按照各自的轨道走下去。现在被此书从传记的学术性角度推进了一步,以至于提出了作家传记与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互文”的观点,虽不一定成熟,毕竟是一家之言,但是一种能够不断追踪下去的研究思路。我将这种启发性都一股脑儿地算在这本专著的成绩单上了。

2016年4月15日于小石居草成

序 言 二

发现、超越与突破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序

全 展

赵焕亭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将要修改出版了，我真心为她高兴。当她在电话中再次希望我写一篇序文时，我还是感到了一丝犹豫，毕竟自己的学识水平有限，要为一个博士/教授的大作写序，底气不足啊！可焕亭真诚地对我说，我了解她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很早便读到了她成型的全部论文，也编辑发表过她博士论文中的部分章节，完全是有发言权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人不能矫情，于是，我便答应了她的这一请求。

我跟焕亭相识于古老而美丽的河南大学，那是2011年5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16届年会上。当时，她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刘勇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会后不久，我便收到了她寄来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调查问卷》，涉及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传记的史实性（真实性）与可读性（文学性）等13个问题。她还来信就“现代作家传记的基本特征”问题与我进行探讨。此后还寄来她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读到来信和著作，我感到她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她将要完成的博士论文充满了期待。

待读到《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时，还是不禁为赵焕亭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感到惊喜。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专题性研究，这部论著呈现的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无疑具有传记研究的范式意义。著者的研究重在发现、超越与突破，真正给人一种高屋建

瓴、直抵要害，并与众不同的新鲜感。

这部著作值得称道的，首先在于著者对传记材料竭泽而渔般的搜集与梳理，精心选取个案，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该书“附录：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统计”，涉及各类传记作品431部，其中“传”273部，“评传”86部，“传论”7部，“正传”10部，“外传、别传”3部，“图本、画本传记”25部，“合传（包含多人评传）”27部。这看似简单的统计数据，凝聚着著者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劳动付出！我们知道，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它是学术观念、学术研究土壤、研究队伍、研究方法及作家文学史地位等多元因素的立体投影。而围绕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除了一大批研究论文、书评外，已经出版的还有朱旭晨的《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房福贤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研究十六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等论著，一些学术专著的部分章节亦多有涉及。因此，赵焕亭的课题研究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仍具有较大的难度。

好在焕亭是个勇于挑战并能不断创新之人！她深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学现象如作家创作、文学刊物、文学社团、思潮流派、文学的流通与传播、作家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作家与政治的关系等，都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问题，透过作家传记可以对上述种种问题有深切的把握，可以更加具有现场感地触摸到文学史的深处”。同时，她也深知现代作家传记的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对传记个案的选择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去阅读和辨别。一方面是巨大的学术诱惑，另一方面是巨大的现实困难。焕亭迎难而上，从众多的现代作家传记中选取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研究价值的文本，再进行深度阅读，最后确定了16部传记作为研究个案。包括钱理群的《周作人传》、袁庆丰的《郁达夫传》、宋炳辉的《徐志摩传》、陈丹晨的《巴金全传》、林志浩的《鲁迅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张耀杰的《戏剧大师曹禺》、黄昌勇的《王实味传》、朱珩青的《路翎传》、金介甫的《沈从文传》、韩石山的《悲情徐志摩》、王一心的《〈小团圆〉对照记》、施建伟的《林语堂传》、余连祥的《茅盾传》、肖凤的《冰心传》、季红真的《萧红全传》。这些传记大多是在一段时期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优秀个案，亦有少数是存在一定偏颇与争议的个案，都有言说与阐释的空间。不独如此，她还对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

与现状进行了一番分析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进行整体观照，重点研究。整部著作除“绪论”“结语”外，主要内容分为“第一章 传记作者的主体性”“第二章 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第三章 传记中的原型考证”“第四章 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大都是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前沿核心问题或重要问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有的问题如“传记作者的主体性”，学界虽有一定研究，但未曾像这本论著深入细致。有的问题如“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则是前人从未涉猎的，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这本论著通过精心评析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典型文本，认真探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一些特征，着力发掘作家传记的独有价值，它必将有助于我国传记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同时，也将大力促进对所选传记传主及传记作者的深入认识。

论著另一大特色便是对话意识与批判精神，著者自觉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传记作品，积极有效地介入创作，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记得学者董炳月曾将“现代作家传记”明确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其本质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钱理群则将作家传记的写作称之为“灵魂的搏斗”。他借用胡风的说法，“写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传记写作者与传主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那么，作为作家传记的研究者与作家传记的写作者，是否也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关系？其研究的过程，是否也是“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焕亭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发现眼光，在论著中与传记作家展开了真诚的心灵对话。她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16部传记个案进行价值判断——从历史的、时代的、比较的视角出发，进行与其内容相应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精神的、伦理的、原型的分析，评判传记创作的成败得失。如谈论“钱理群《周作人传》中的作者学术个性”一节，便充分体现了著者艺术的眼光和人性的眼光。尤为突出的是，作者将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与学界影响较大的几部周作人传进行比较之后，深切感受到钱氏本人的学术品格和个性追求，认为钱理群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宏大的气魄在《周作人传》中均有体现。由此自然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有明显的学术个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鲁迅为参照系来写周作人；二是

探索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对二者的研究中，传记蕴含了钱理群一贯的学术追求，融入了钱理群的生命体验。”这确实是作者的会心之论。在对钱著《周作人传》作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和微观探究的基础上，焕亭一方面回顾钱理群的出身、经历、职业与他对周作人心灵史的探求之间的密切关系，系统地总结带有普遍意义的创作规律，另一方面又置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于广阔的社会政治及世界人文背景之中，前后左右，广泛地进行阐释研究，从而呈现恢宏廓大的气势。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座通向理解《周作人传》思想与艺术的立交桥。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著者在充分肯定钱理群写作《周作人传》的巨大影响和成就的前提下，本着“当仁不让吾师”的求是精神，如实指出传记的短处，“大部分《周作人传》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大段摘抄周作人本人的作品’这个问题在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同样存在”。

再如阐释“袁庆丰《郁达夫传》中的作者情感投射”一节，亦体现出研究者真诚的批评态度，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批评的诚意，同样是传记研究者与传记作者之间的一次情感交流与心灵对话。著者旗帜鲜明地提倡传记写作的作者主体性，肯定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的精神契合，但同时还对作者主体性的过度发挥保持着某种适度警惕。一方面肯定了袁庆丰或显或隐的主体性发挥——对作者体现出的个性心理、学识结构、文学观念等表示欣赏，认为“的确可以感受到灵魂的颤动。处处可以感受到叙述者‘我’的强大存在，因此，这部传记既是‘传写’郁达夫，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传写’袁庆丰本人”。另一方面又如实地批评作者主体性发挥过度的问题，认为主体性过度发挥所带来的弊端——容易造成传记失真、失衡现象。这种切中要害、及物的分析评价与判断，褒贬明确、秉笔直书，见解犀利而又分寸得当。它保持了批评的批判性、独立性和超越性，这无疑是加强和改进传记文学批评的不二法门。

重视文本细读，体现较强的学理性，充分展示出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亦是这部论著的突出特点。记得焕亭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曾两次与我通话，为其课题研究的理论性不强深感苦恼。而我则以为，能够提出某种传记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固然好（毕竟是少数资深专家或新锐学者能为），但重视文本细读和个案研究，重自我审美感受的直觉性，从个别审美现象出发的实践性，亦不失为对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一种贡

献。读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深感材料翔实，立论新颖，分析细致，论证严密，理性与诗情、史笔与文采合而为一，在重建人文精神方面为今天的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营养，从传记文学创作/研究方面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这部著作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学理性是衡量传记文学批评价值的重要尺度。在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中，学理性的体现是多态的。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富有哲学意味的学理，又有精于钻探、深于挖掘、探析系统的学理，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著者重视文本细读，总是历史地、具体地切入问题的要害，而不是简单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或从结构上着手，大刀阔斧，见出传记作家艺术构思的匠心；或从内容上剖析，层层剥笋，道出传主的人格真谛；或一传细品，于条分缕析中洞见传记迷人的魅力；或数传对读，于异同比较中悟出各自风采。总之，焕亭的细读读出了精神韵致，颇具力度深度。如她采用传记批评的方法，对《巴金全传》这部个性鲜明的作家传记进行体察入微的分析，认为“巴金的梦”作为关键词，是陈丹晨在全传章节命名上最为独特的地方，从追“梦”的巴金、全传的结构特色、陈丹晨也是个追“梦”之人三个层面作了详尽分析。从作者长达20多年的创作历程及其执着精神，谈到作者狷介与耿直个性确与传主巴金有些相似。认为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使得作者真正走进了传主的心灵深处，写出了真实的巴金。这种判断，体现出研究者的学识和细读的水磨功夫，更能接近丹晨当时的创作心境和实际，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再如焕亭在“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一章的论述，无论是以施建伟《林语堂传》为例，条分缕析林氏童年所感受到的家庭之爱和自然环境之美，从而正确理解林氏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向以及日后“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人生选择；还是以肖凤《冰心传》为例，层层剥笋般探讨亲人之爱、大海之美、读书之乐之于冰心最深刻的童年经验，继而孕育出冰心“爱的哲学”，构成了传主日后创作的发展及特征。著者认为：作家传记的童年叙事，蕴含着丰富的启发性资源，具有对文学史的补充价值；它启迪我们，从作家童年的成长环境中可以寻找解读作家及其作品的原始密码，同样是中肯之论。此外，像“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传记中的原型考证”等章节内容，无论是传主创作成功或

创作下滑之原因的探究反思，还是传记的原型考证及其意义的阐释解读等，著者大都下足了功夫，体现出较强的学理性，值得一读。

诚然，著者在深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艺术殿堂的过程中，难免有着某种不足。对此，焕亭也在新近修改的“后记”中特意附录了三位评审答辩专家的意见，并对原文中表述不到位的地方做了适当的修改。我欣喜地得知，焕亭 2015 年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鲁迅传记研究”，希望她继续努力，与鲁迅这座巍峨的远山以及众多鲁迅传作者展开心灵的对话，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全展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荆楚理工学院教授）

序言三

在十五载学术跨越的背后

——赵焕亭和她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

王一川

赵焕亭教授的这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经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多年修订即将出版，要我写点什么。我最初感觉不便写，因论文非我指导，且该领域又离我较远。但后来想想还是该写，不为别的，单为这位我曾带过的硕士生自入学以来所完成的令我称奇的15载学术跨越。否则，我总会感觉对她有所亏欠。况且，她已对此书的序言作者做了妥善安排，再由我这位她的过往见证人来说点话，也似在理了。

焕亭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时于2002—2004年指导过的教育硕士生（另一位指导教师是陈雪虎教授）。记得那时她同其他十几位教育硕士生一道从中学考上来，我作为当时的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统一接待他们并随机分配给教研室各位导师。焕亭同另外三名同学一道由我指导。这批在职硕士生与我和同事们过去带过的学术型硕士生相比，虽然学术基础偏弱点，但求知欲却异乎寻常地强烈。这从如下一事可略见一斑：他们（包括其他教研室接收的教育硕士生）的上课积极性如此之高，迫使我的“文艺学专题”课在前两周先后两次更换大教室，从教学楼到艺术楼再到敬文讲堂这全校最大的教室。这件小事本来不算什么，且早已遗忘，但多年后焕亭的提醒才促使它重新浮现在记忆里：“当年您上文艺理论课时的火爆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本来一开始课好像是安排在某个教学楼，结果上课时，发现教室座位不够，于是又临时调到艺术楼的大教室。那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蜿蜒在北师大的主路上。我当时心想，估计这支队伍里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蹭课者，所以教室的座位才会不够。更为惊叹的是，

后来，再次上课的时候，艺术楼的教室里也坐不下了，只好又调到敬文讲堂去上。那时心里很有一些鸠占鹊巢的歉疚感，但是还是忍不住经常去蹭课。反正，您的文艺理论课我是反复听了多遍。多么难忘那时候学习上的如饥似渴！无限感念您的智慧启迪！”我自知，与其说我的课有啥吸引力，不如说这批重返大学校园的学子们本身拥有异常旺盛的求知欲。尽管如此，起初一段时间，焕亭的表现并不活跃，多是在埋头听课、读书，偶尔发言似也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而我自然也没对她将来能做学术抱有什么期待，一心想的还是完成学校交给的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的任务。但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当时令我印象较深的还是焕亭那双清秀、沉静而又明亮的眼睛：它们似乎总在默默工作，吸纳以及内化，仿佛具有随时把一切都牢记在心、融化于血液中的本领。她在我的“文艺学专题”及“文艺美学专题”等课上总是要么全神贯注地听讲，要么低头阅读和思考，有时也在课余时间来问点问题，但更多时间是默默无闻地听课、看书和思考，整天都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其刻苦精神令我感动。尽管如此，我那时对这位来自中学的硕士生能在学术上提升到什么程度也没敢多想。

直到有一天，翻读她交来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初稿时，我才吃了一惊：她居然想到用我倡导的“修辞论美学”思路去重读中学范文朱自清的《背影》，并且像我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里分析丁玲的《韦护》和洪灵菲的《流亡》等作品那样，要从朱自清的字里行间“发现”作者本人对待父亲的双重态度时，我不得不在心里对她另眼相看了：这丫头脑瓜子还真灵，有一双我十分看重的解读文艺文本的慧眼！我当即要她进一步细化文本分析，并注意从朱自清本人的其他作品及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写作中作扩展讨论，深入发掘这种隐秘的无意识文本的历史性。待她后来完成论文并提交答辩时，果然受到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我那时甚至欣喜地想过，凭她练就的这套文本分析本领和其他综合素养，回到中学教师岗位后，没准还真能在语文教学改革领域做出点特殊业绩来。

过了几年，陆续接到焕亭的喜讯：她把硕士论文中的观点带到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表，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甚至权威人士的好评，说是为现代文学文本解读、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学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再后来，她已从中学调到平顶山学院教书，成了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教师。我刚为她

的快速进步而高兴，而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她充分利用访学进修的时间备考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我既为她的不断向上跨越的劲头而感动，也为她舍弃正常家庭幸福而冒险苦拼的未来而担忧，特别是外语能达到要求吗？她丈夫和女儿能理解吗？诸如此类。但看到她坚毅而不可动摇的眼神，再多说也没必要了，就只能默默祝福她顺利和成功。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上天真是眷顾像她这样敢于吃苦和锲而不舍的能人：她终于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考上了博士生！接下来的事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她苦读三年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答辩，回到平顶山学院继续任教，很快完成从副教授再到教授的晋升历程。顺便说，她这些年来妥善处理了个人学术跨越与家庭的可能的矛盾，夫妻恩爱、全家幸福如初，值得对她和她的家庭点赞！再有，连她在内，我带的这四名教育硕士生中有三名都先后成了博士，其中两人晋升为高校正教授、一人为市教育局副局长了。想想不禁为这批教育硕士的学术跨越之韧劲而感动不已！

翻开这部题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专著，从焕亭精心敲打出来的密密麻麻而又齐齐整整的汉字间，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首先“看见”的却不再是其选题如何创新以及其研究如何在学界该领域实现新的开拓（尽管这一点十分重要），而是她这十多年来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坚韧不拔的追寻者身姿及其深深的跋涉脚印！它们仿佛在无言而又有力地告诉人们：是真金总会闪光！而金子的闪光其实是以坚韧去磨砺成的。

回看焕亭的硕士生阶段可知，眼前这部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中可以说早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妨摘抄留存在我电脑里的她的经批改过的硕士论文《修辞论美学视野中的〈背影〉——兼论中学语文创新阅读》摘要。

“本文首先在修辞论美学视野下，考察《背影》的阅读史，从中见出《背影》的解读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语境的对应关系：《背影》在渴望安定、呼唤温暖的社会动荡期，被视为一曲亲子之歌；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转型期，被视为青年人灵魂的腐蚀剂；在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稳定期被视为父爱的颂歌、黑暗社会的缩影、晚辈忏悔的心声等。其次，在了解前人对《背影》种种解读的基础上，采用修辞论美学的方法，主要通过对《背影》中重复现象的分析，对《背影》做出了重新阐释，从而发现《背影》的深层蕴含：它揭示了朱自清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矛

盾和焦虑，而这种矛盾和焦虑是20世纪上半叶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背影》正是这种矛盾和焦虑的一种审美置换。最后，从上述研究中得出对中学语文创新阅读的一些启示：语文教师要善于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努力开掘文学作品中的立人因素、注意运用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来指导阅读教学等，并尝试把这些启示运用于《背影》的课堂教学中。本文运用修辞论美学的方法，通过对《背影》阅读史的考察及对《背影》主题的再审视，揭示了《背影》深层的文化意蕴，这有可能为语文教材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为语文创新阅读显示一条新途径。”

当她尝试从《背影》的字里行间“读”出潜隐于其间的朱自清本人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矛盾和焦虑”时，她其实正是在从事一种日后必将常用的基本的学术训练——透过包括作家传记在内的文艺作品而发现以往被忽略的著者的主体性构建的踪迹，特别是主体在其无意识层面的隐秘踪迹。硕士论文阶段对朱自清的被压抑的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同博士论文阶段对传记作者的主体性的构建之间，应当存在一条相互连接而又不断深化和成熟的清晰线索。

当然，要将硕士生阶段的学术训练沉落为更具学术含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必然意味着更加艰辛的精力付出和更具创造性的系列学术发现的聚合，这中间当然会包含她的博士生阶段导师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指点和帮助。至少从如下被她作为对象直接研究的16部传记作品书单里，就足可见出其阅读与研究量之大及探究路程之艰辛了：钱理群《周作人传》、袁庆丰《郁达夫传》、宋炳辉《徐志摩传》、陈丹晨《巴金全传》、林志浩《鲁迅传》、田本相《曹禺传》、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黄昌勇《王实味传》、朱珩青《路翎传》、金介甫《沈从文传》、韩石山《悲情徐志摩》、王一心《〈小团圆〉对照记》、施建伟《林语堂传》、余连祥《茅盾传》、肖凤《冰心传》、季红真《萧红全传》等。

要在阅读这批当代学者撰写的现代作家传记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一种双重理解，即，既理解被传记作家所研究的现代作家、又进而研究传记作家本人，势必需要一种双重付出和创造。在这项双重付出和创造的工作中，跨越时代、人生经历、政治态度、文化选择及个性等诸多距离之间而展开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莫大的难点和重点了。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意味着实现被作传的作家的主体性与作传的学者的主体性之间的理性分析。